

湘江头条

又临碧泉

——湘潭碧泉书院重建开工走笔

廖慧文



重建后的碧泉书院效果图。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金国大将兀术带铁蹄奔袭扬州。

宋高宗赵构狼狽渡长江，登舟在海上漂泊了4月之久，直至金兵北撤，才返回临安（杭州）。

皇帝尚且如此，臣民的命运又如何呢？战火所及，流民遍地。战火未及之处，也有大盗蜂集，地方豪强趁乱而起。

这年冬季，55岁的大儒胡安国欲返湖北荆门的家中。行经洞庭之北，他骤然得知，荆门之家被群盗焚毁，家中文书数千卷悉为灰烬。

已经“抱病瘳久”的胡安国只好艰难地渡洞庭而南行，在黎明与杨训两名弟子的护送之下，至湘潭县城西南40公里处暂时安顿了下来。

此地“莽野荒墅”，人烟稀少，且“冬郁湿薪，急雪堆户”，但还算安稳。

胡安国很快发现，这里的溪水极清冽。他想起当年行涉湘流的屈原，感慨：“此非沧浪之水乎？何其清之甚也！源可寻而濯我缨乎？”兴之所至，循溪至源头，只见苍然群木之下有泉水，翠绿澄净，藻荇交映，当地人称“碧泉”。

2025年冬，我临碧泉观水。碧泉涌为潭，水色缥碧，泉眼处不时浮起细密的气泡，十几尾鲤鱼悠游藻荇之间，观者可直视无碍。

美好的事物能让人暂时忘却烦恼。正是这一泓泉水，安慰了近900年前那位饱经离乱的大儒。依然能意识到它的幽深美丽，这何尝不是我们的幸运。

如今，碧泉背靠山林，面朝村道。碧泉村沿着村道和山坡，缓缓延伸而建。寻开阔地远望，冬日暖阳照耀，近丘远峦笼在薄雾青霭之中，林木色彩缤纷，好看极了。这儿的山不高耸，属衡山余脉，距离衡山主峰也不过30余公里。

碧泉不远处，有碧泉书院遗址。1129年那个寒冷的冬天过去，胡安国的儿子胡寅、胡宁、胡宏携家眷陆续至此团聚，在碧泉平安地度过了一年多。

到了绍兴元年（1131年），这块净土同样蒙上战争阴影，一大家子又被迫辗转邵阳、永州、全州等地。虽然为避寇而频频奔逃，但胡安国并不因苦困而凄切。他对弟子说：“不惟避寇，应人切不得望要事事足意，得常有些不足处便好。”做人得有个心宽则天地宽的好心态。

绍兴三年（1133年），胡安国回到碧泉畔。这一次，地方安定，他有了终老之心，于是买山结庐置田，结交“十里乡邻”，建起了碧泉书堂。5年后，胡安国去世，胡宏继承父亲的遗志，将书堂发展成了碧泉书院。



碧泉潭。 通讯员 摄

碧泉书院在历代经历了多次兴废，只余下一个荒凉的遗址。而后，村人在上面搭起民房，书院的碎砖片瓦也难以寻觅了。

1997年，王立新第一次来到碧泉。当时，身为黑龙江人的他，因热爱湖湘文化而离开东北林业大学，入湘潭大学任教。碧泉书院是“肯定得来看看的地方”。他买了张湖南地图，找到碧泉所在，一早从学校蹬着自行车入山来了。土路很窄，雨后泥泞，走得艰难，他一路骑车一路询问，不懂乡人方言，只能靠用手杖在泥地上“笔谈”问路。“早上八点到中午一点，5个小时才到。”如今，王立新已是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他对我们说起二十多年前的那次寻访，仍然细节满满。

差不多也是在那段时期，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来到碧泉踏访，“水势真大！”这泓千年清泉，一如古籍所述，他喜出望外。“碧泉书院是‘上游’，岳麓书院是‘下游’，我一定要来的。”初见时村落规模如何，道路如何走，他说得清晰。到今天，他已经数不清带着学生来过多少次了。

他们的神往与执着，皆因碧泉书院的特殊——它不仅仅是宋代湖南第一个独创性书院，更是湖湘学派的发祥地，为湖湘学派的产生和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学术土壤。

在碧泉书堂，胡安国完成了《胡氏春秋传》，强调《春秋》是“拨乱反正之书”，治学紧密联系王朝内外交困的现实。他被尊为湖湘学派的创始人。

其子胡宏则是湖湘学派的奠基者。他说，治学目的就是“治国平天下”。他在碧泉书院讲学时的内容被辑录成著作《知言》，提出了人具有自然属性；不能视天理人欲为水火。他还认为，名与实的关系，是先有事实再有事实的名称，名应如实，名实相符。这本重要著作，标志着湖湘学派以尊王攘夷、内圣外王、体用并重、知行合一为核心的经世济民思想体系的成熟与定型，“令人目中浮翳为之一开”。

“据我考证，书院规模不大，当时的学生并不多，大概就是十三四个弟子。”王立新说，但成才率很高。胡宏对弟子们的教学方法，遵循《中庸》提出的“学、问、思、辨、行”的原则。所谓“学”，主要就是读书。他对弟子说：“读书一切事，须是有见处，方可。不然，汨没终身，永无超越之期矣。”要求弟子在读书的过程中，不仅要从中读出义理和经世的方略，读出文字以外的精神，还要根据社会和人心的需要，做出取舍。

湘学的源头，在碧泉。这一方源头活水没有被遗忘。

王立新记得，在碧泉村向村人打听书院及胡氏后人时，老者对胡安国并不直呼其名，而是恭敬地称“文定公”。

2017年6月，湘潭大学哲学系教授陈代湘向全球发出“重建碧泉书院”的倡议，被《湖南日报》等主流媒体关注后迅速有了转机。2018年4月，时任湘潭大学副校长刘建平教授率队前往考察碧泉潭开发与碧泉书院重建工作。他认为，双院区重建碧泉书院，有利于当地的文化旅游建设，又能结合湘潭大学现有优势，发挥传统书院功能。7月，湘潭大学在原有哲学系、历史系基础上，组建碧泉书院。这些年，书院研究成果丰硕，成为了“湘学”研究重镇。

在原址重建碧泉书院，是众多研究湖湘文化的学者和爱好者们的心愿。

今年，在湘潭市和湘潭县村民的大力支持之下，碧泉书院遗址的土地被重新平整。12月11日，湘潭碧泉书院恢复重建项目正式开工，工期约为一年半。

展开施工效果图，承建方介绍，新建的碧泉书院将复现南宋书院的风格，依山就势，主体为“三路三进”格局，除讲学、祭祀等传统功能之外，还融入学术研究、文化展览、研学实践等现代功能，使之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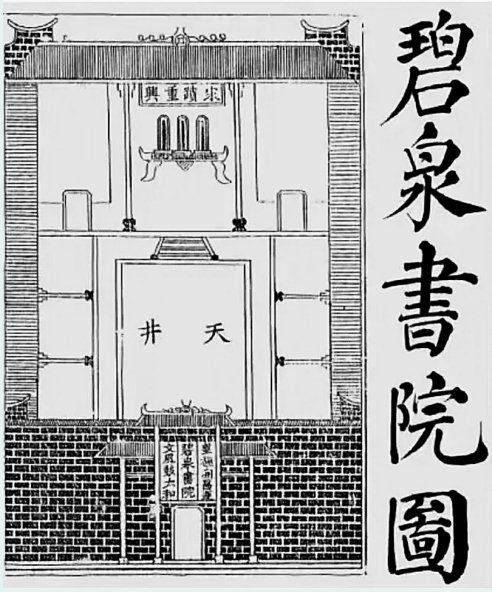
“庭栽疏竹容驯鹤，月满前川待补楼”（胡安国诗）；“旧栽沿岸柳阴合，新种数株梅子成”（胡宏诗），胡安国胡宏父子曾栽花木饰修居处，为弟子读书提供清幽环境。新建碧泉书院的设计者也表示，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29岁的张栻奉其父右相张浚之命负笈至碧泉书院求见胡宏。在这里，他追随胡宏潜心学习理学，在碧泉畔“洗盏酌寒泉”，度过了一段不长但难忘的求学时光。

胡宏逝后，与父母合葬于距碧泉村十公里外的隐山南麓。他的弟子张栻、彪居正、吴翌三人先后被聘主持岳麓书院学政，得以将胡氏父子的思想与学风发扬光大。

张栻主张格物致知，知行互发。在他主教岳麓书院期间，乾道三年（1167年），著名理学家朱熹从福建来到长沙与张栻相研学术，“朱张会讲”后，岳麓书院名声大噪，很快取代碧泉书院成为湖湘学派的中心。“自此之后，湖南地区的文化由楚文化（湘楚文化）转变为儒家文化（理学文化），湖南地区成为著名的‘理学之邦’。”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方红蛟说，碧泉书院为岳麓书院“上游”之称，名副其实。

南宋后期，湖湘学派逐渐没落。但它作为湘学的开端，融入湖湘士人的精神，启迪着湖南后世英才。之后，王船山总结宋明理学，曾国藩、左宗棠等晚清理学家巨叱咤风云，近现代湖南人才辈出，对中国社会政治和思想学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清代县志中的碧泉书院图。

将根据文献记载来移竹栽桂，理水掇山，贴近宋时文人的趣味。

在胡氏父子生前与师友咏咏不绝的隐山之中，一众湖湘文化学者拜谒胡安国夫妇、胡宏之墓。山坳间木叶纷纷下，松柏茂盛依然。湘潭文史专家何歌劲表示，隐山得名正是因胡安国。“夷犹异地聊为老，流落名山可当归”，一生经历两宋易帜战乱的胡安国终于安心在此隐逸终老，安然沉睡。

何歌劲于上世纪90年代在隐山做过详细的田野调查，他向众人介绍着隐山的古木古桥、名人故居。田野丘陵间蜿蜒的小河的另一头，连着桂在堂——左宗棠夫人周诒端的娘家。左宗棠在桂在堂生活达13年之久。他在桂在堂西屋辟书斋，并撰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在桂在堂的时光，他研究地理学、农学、水利、田赋等，为他“穷经将以致之用”的理学经世思想和一生辉煌的功业奠定了基础。

“新的碧泉书院落成后，希望能和隐山联动起来，成为一个文化园。”何歌劲说。

“如何让碧泉活起来？必须激发人文精神，从根本上依托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开展讲学活动。比如研究生的开题和答辩可以在这里，研究生关涉湘学的讲课也在这里，让当地的老百姓来‘凑凑热闹’。”王立新说。

“碧泉书院重建后，可以与岳麓书院联动，做‘重走张栻之路’之类的活动，促进文化交流和书院复兴。”邓洪波说。

又临碧泉，大家言笑晏晏，谈古说今，又令人想起碧泉书院盛时“远邦朋至，近地风从”的情境来。

沈从文《十城记》猜想

舒维秀

作为湘黔边界澧水河边的晃县龙溪口古城，应该是纳入沈从文写作《十城记》的计划的。

1934年元旦起，沈从文创作的小说《边城》连载，4月19日最终创作完成。1977年1月从文先生致友人书信中回忆：“四十年前写的小故事《边城》，当时就是住在青岛，与兆和同志去崂山‘北九水’玩时，适值雨后新晴，快到北九水时，有山溪水泛滥到路上，凡人蹲下玩水时，听到半山上有个女孩子哭声，抬头看到女孩子手上正执了个小小白纸幡，知道必是家中死了人，照老规矩去附近向‘土地’告庙。我当时就告兆和，我可以写个很好的小说给你看看，她当然以为说过后就完事，不会相信。可是不多久，回到北京，就写成了《边城》。”

《边城》之后，从文先生陆续创作了《长河》《小砦》《芸庐纪事》等小说，“凤凰也要写一个”，写成十个时，汇成《十城记》。

1942年5月20日，从文先生致信大哥沈云麓，谈及自己的写作计划：“《长河》已成十三万字，不久可付印。今年我还打算把另外一个作品写成，名叫《小砦》，用王村作背景，有七万字八万字左右。《长河》有三十万字，用吕家坪作背景。写成十个时，我将取个总名，为《十城记》。沅陵也有一个，名《芸庐纪事》，已有二万字，我预备写十万字。把你当主角，将来必有许多人读来发笑。凤凰也要写一个……”

1945年8月3日，重庆《大公报·小公园》刊发《沈从文写十城记》，文中称，“作家沈从文向以多产称，自为联大教授以来，产量大减，沈氏顷致友人，谓拟以湘西为背景，写成‘十城记’……现已得其四，第一城名《边城》，以茶峒为背景；第二城名《小砦》，亦以小村镇为代表；第三城名《长河》，代表沅江流域；第四城为《芸庐纪事》，以沅陵为背景；第五城，正写作中，尚未定中。”

1948年，从文先生曾在《边城》初印本封面上陆续写下如下题记：“本拟写十城记，应当回去完成另外九个。现在看来，这事恐怕得交给下一代去了……”

从这些前后八年的回忆、书信、报道、题注题辞等记述可知，从文先生对《十城记》是何等的上心，最后完不成计划，内心又是何等的无奈。边地小城、土著军人、底层民生、凄悲风物等元素，触发了从文先生的《边城》写作原动力。从文先生的写作《十城记》中，已完成或列入写作计划的有，《边城》《小砦》《长河》《芸庐纪事》四个，当时正在写作中的第五个，应该是凤凰。那么，另五个计划中的小城，是哪五个呢？

晃县龙溪口古城极可能是其中一个。

晃县位处湖南最西端，北西南三面楔入贵州，晃县县城由老晃城、龙溪口古城、太阳坪三片区域组成，其中龙溪口古城是旧时湘西沅水上游三大码头（沅陵、洪江、龙溪口）之一，因龙溪在此汇入沅水上游的澧水河而得名。

古城兴起于明末清初，主街临河，三百米长，东段五十米初属贵州，叫贵州街。黔人于此下游设厘金局，抽走了大笔税金。此地商贸频繁，官军匪众聚啸。歹人在龙溪口犯事，即便是杀了人，逃进贵州街后便万事大吉了，官家以“属地管辖”为名，追捕到此为止。从龙溪口古城西去十公里起至二十公里河段，北岸属贵州，南岸是湖南，一河两省，北已叫溇阳河，南仍称澧水河。这里风景秀丽，商贸繁荣，人事无章，民生维艰。从文先生写于1938年的《沅水上游几个县分》有详细描述。

“由芷江往晃县，给人的印象是沿公路山头渐低渐小，山上树木转增密

蒙。一个初到晃县的人，爱热闹必觉得太不热闹，爱孤僻又必觉得不够孤僻。就地形看来，小小的红色山头一个接连一个，一条河水弯弯曲曲地流去，山水相互环抱，气象格局小而美，读过历史的必以为传说中的古夜郎国，一定是在这里。”“湖南境的沅水到此为止，自然景观物到此越加美丽。”

“晃县的市场在龙溪口。公路通车以前，烟贩、油商、木商等客人，收买水银坐庄人，都在龙溪口作生意。地方被称为‘小洪江’，由于繁荣的原因和洪江大同小异。”“烟土既为本地转口货大宗生意，烟帮客人是到处受欢迎的客人，”“‘另外有个烟贩，由贵阳乘车到达，行李衣箱内藏了一万块钱法币，七千块钱烟土印花，落店后，半夜里突然有人来‘检查’……把那钱拿跑了。这烟贩不声不响，第二天就包货一辆汽车回转贵阳。好象一抢便已完事。县知事不知道是谁作的事，烟贩倒似乎知道，只是不说。君子报仇三年，冤有头，债有主，不用官家麻烦。”

“十五年前在沅水游称一霸，由私塾教学先生而变为土匪，由大王而变为军人，由司令而咔嚓一刀。外县人来到晃县，提出这个人的名字时，如今尚可以听到许多故事。这人名姚继虞，就是晃县人。十年前又有个北京农科大学毕业生，为人热情而正直，身个小小的，同学中叫他‘毛胡子’。大革命时回到故乡作农会主席、党务特派员，领导两万武装农民，到芷江县入城示威，清党时死于芷江南城门前。这人名唐伯廉，也是晃县人。”

1982年5月中旬，新晃侗族自治县民政局收到沈从文先生寄自北京的信件，展信阅读，一笔清秀毛笔小楷，从右往左竖写，正是从文先生笔迹，谈起唐伯廉。“唐伯廉是晃县城里人，记得抗战时，我由沅陵去昆明时，还去他家中请训过他的姐姐。她是一九二七左右去北京民国大学上过学的。我于一九二三年在北京即和唐伯廉相识，他当时在罗庄庄农业大学习农科，人矮小精悍，待朋友极热情，当时二宿舍约共住十二人，均湘中同乡彼此极要好，大部分回去正值大革命时，可能都牺牲了……”

唐伯廉，1899年9月4日出生在现在的新晃侗族自治县波洲镇暮山坪村，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1926年9月至10月，受组织委派回芷江领导农民运动，帮助国民党筹建芷江县委部，1926年10月26日，秘密领导成立了中共芷江特别支部。1927年4月20日在芷江被反动军阀杀害。葬于老家暮山坪后山岩背冲。

沈从文至少在三篇文章中专门讲到唐伯廉，分别是：《桃源与沅州》（1935年3月）、《沅水上游几个县分》（1938年）、《回忆黄村生》（1981年）。可见唐在沈心目中的位置。

沈从文曾说他是沅水边的人，离不开汤汤沅水，早年在沅水流域各地辗转，即便后来离开了此地，书写的仍是这块土地上的人和事。

边地，小城，水，风物，贸易，兵匪，人事，构成了晃县龙溪口古城的主要元素，也是沈从文小说的主要构成元素。我猜想，龙溪口古城被纳入沈先生《十城记》写作计划，应是大概率事件。

当然，沈从文早年生活工作过的初恋伤心地芷江，“从文”得名地怀化镇，如果说也能纳入《十城记》写作计划，也极有可能。那么，且慢，还有两城呢？以我浅陋的视野，连“猜想”都不敢了。

在时代的变迁中，完成《十城记》

写作计划已成为先生渺远的梦了。现在如果有人想写新《十城记》的话，可写的元素比沈从文时代不晓得要多好多。



新晃侗族自治县龙溪口古镇城门。 通讯员 摄